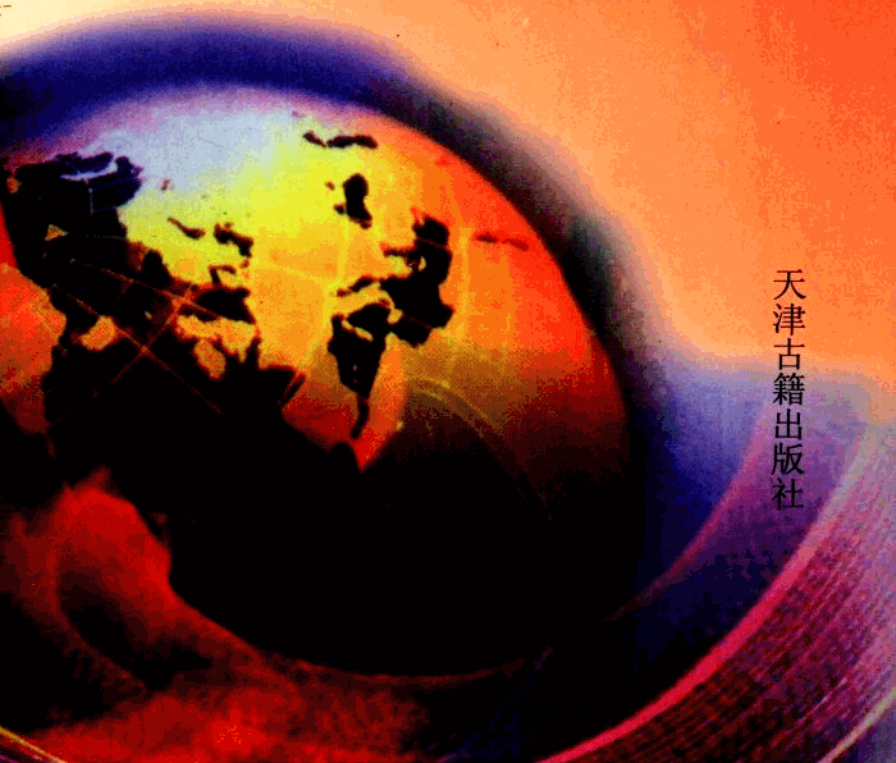


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

中外近现代历史专题比较研究

杨升祥 解琦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序 言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真谛。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深刻地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中，历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曾经这样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还曾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除了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毛泽东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继承者。这种创造与继承的成功结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慧悟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历史学方面的修养和功力，对于指导人民革命、推动历史前进，体现出显著的作用。邓小平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与其对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的深刻了解与分析总结是紧密相连的。他在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

时谈到：“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曾强调：“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邓小平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虽然三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职务，但他在挫折和逆境中，仍然无私无畏，沉着坚韧，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历史的发展进程，以脚踏实地的历史实践，努力地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深厚的历史识见与其酷爱读史是分不开的。1969年10月23日，在“文革”风暴席卷神州之时，邓小平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保护下，来到江西省新建县的望城岗，开始了将近五年的下放劳动。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而且还研读了《二十四史》和其他古典名著，尤其喜爱《资治通鉴》，几乎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他潜心思虑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索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此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乐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时期，江泽民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1996年夏天，江泽民先后邀请了八位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述，并共同加以研究。由此可见，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工作中，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学习、研究历史极为重视。江泽民深刻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

结业式上再次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取鉴于历史的例证不胜枚举,中外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已深刻证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如果脱离史学的基础,就会影响远见的萌生,从而导致短视而贻误决策。

研深覃精,比较鉴别。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分析,是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历史比较研究的功能同一般历史研究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通过认识历史而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更好地创造新的历史。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探索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更好地立足现实、开拓未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是与非、善与恶、利与弊、得与失进行比较,从中探索共同的规律和因果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历史比较方法视为理解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它能帮助人们通过历史比较进行思考,从已知的历史事物的特征中,合理地推出未来的历史事物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比较研究的具体历史问题和类型有:社会形态比较、国家比较、阶级比较、政治制度比较、学术思想比较、历史事件或人物比较等。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一部用唯物史观比较、分析历史的名著,他把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与1848年的德国革命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进一步提出,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不同的发展阶段及相互关系研究清楚,要在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比较研究的例证处处可见,既有国情比较、阶级比较、历史比较、过程比较、理论比较,又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毛泽东往往是通过反复比较,来把握事物的实质和特征。例如,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在商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给刘少奇的信中,对法国拿破仑第一时代的土地政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日本封建土地制度、美国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形成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策基础。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比较分析。《邓小平文选》中的许多观点,正是通过大量的各个角度的历史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例如,他强调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就是通过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而论证的。邓小平从1984年到1992年,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针对人们思想理论上的困惑和认识上的分歧,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明确、透彻、精辟的回答。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始终把握着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生动而具体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普遍与特殊规律,为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披览前踪,鉴往开来。这是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比较、分析历

史,总结、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目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对此,江泽民曾概括地总结说:“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其理论渊源、现实根据,又有其历史依据。仅就其历史依据来看,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外近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对一些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五大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逐步确立,历史比较研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要原则,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吸收了专家、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运用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外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重大事件进行了考察,选择其中既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又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研究。在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全书分为经济篇、政治篇、文化篇三个部分,对中外近现代历史中属于重要发展阶段的有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中的

规律,总结值得我们借鉴和运用的基本经验。力求使本书既有专题比较研究的特点,又有内容上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为同志们“披览前踪,鉴往开来”做一点微薄的贡献,并希望得到读者的帮助和指教。

目

录

- 经济篇
- 政治篇
- 文化篇

序言·····	1
---------	---

经 济 篇

第一章 中西方步入近代前的经济差异与不同走势·····	3
一、历史进程中的易位及其原因·····	3
二、步入近代社会的不同驱动力·····	11
三、有别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历史走向·····	20
第二章 19 世纪下半叶中西方经济改革之比较·····	26
一、相同社会经济形态国家的改革·····	26
二、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国家的改革·····	36
三、有违初衷的结局和历史重负·····	41
第三章 20 世纪初西方经济的削弱与中国工业的 “黄金时代”·····	45
一、西方鏖战中无暇东顾,中国夹缝中遇到转机·····	45
二、西方战时经济的困境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	46
三、西方势力卷土重来,中国工业昙花一现·····	52
第四章 20 世纪中期中西方经济状况之分析·····	57
一、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中西方的不同选择·····	57
二、二战中的中西方经济·····	64
三、二战对中西方经济的不同影响·····	66

第五章 中西方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和措施之异同	71
一、不尽相同的内外部条件	71
二、本质不同的经济制度	74
三、基本相似的恢复措施	76
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82
第六章 50 至 70 年代中西方经济新差距的形成	85
一、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差异	85
二、“大跃进”与高增长的不同效应	90
三、乱与定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95
四、开放与封闭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	97
五、形成新差距的反思和启示	99
第七章 当代中西方的经济体制改革	104
一、中西方经济面临的新转折	104
二、中西方经济体制改革之异同	108
三、中西方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影响	118

政 治 篇

第一章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原因	123
一、相似的历程与相近的遭遇	123
二、不同的条件与有别的选择	125
三、值得深思的前车之鉴	135
第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命运	139
一、西方宪法的演变与民国《临时约法》的夭折	139
二、《魏玛宪法》与《临时约法》之比较	145
三、走向危机的西方议会制和寿命短促的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制	147
第三章 中国数次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尝试	156
一、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途径与类型	156
二、中国近代思想家、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艰难探索	160

三、资本主义道路屡试不通的主要原因	176
第四章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	183
一、中国抗日力战持久,代价高昂	183
二、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	191
三、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战场	195
四、中国抗战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199
第五章 二战以后的中西方政局	204
一、实现和平的西方与兵燹再燃的中国	204
二、步入重建的西方与战乱迭现的中国	210
三、中国的独立统一与西方世界的裂变	216
第六章 中西方“乱”与“定”对政局的不同影响	225
一、对中西方“乱”与“定”的比较	225
二、“乱”与“定”的原因探究	233
三、保持稳定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236
第七章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之差异	240
一、理论基础与立论目的不同	240
二、国家机构运转的效率不同	245
三、维护权力统一的作用不同	248
四、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效果不同	250
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	254
第八章 中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与改革趋向	259
一、政党组织制度与组织体系的差别	259
二、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差异	264
三、政党制度改革的内容与趋向	269
第九章 50至80年代的中西方法制建设	279
一、立法活动的稳步发展与重新起步	279
二、法制原则的继续完善与开始确立	284
三、法制道路的渐入坦途与迅速开拓	289

文 化 篇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新学的勃兴	301
一、东风无力西风疾的缘由	301
二、输出与引进的意向之别	305
三、违背主观愿望的客观效果	309
第二章 西方现代思潮的演变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317
一、新思潮与新启蒙的共同点	317
二、中西文化大论战的过程	323
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和在中国的传播	326
第三章 近现代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历程	331
一、西方科技的炫异争奇与中国科技的时代落差	331
二、科技发展的蹉跎岁月与瞬变年代	340
三、国际高科技竞争及对中国的挑战	352
第四章 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与文化建设	367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不同	367
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不同	388
三、中西方文化的类型不同	399
四、交融综合、创造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402
第五章 现代中西方教育之比较	409
一、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别	409
二、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	412
三、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414
四、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420
第六章 中西方精神文明的歧异与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427
一、中西方精神文明的差异	427
二、西方的“文明病”与中国精神领域的弊症	431
三、实事求是,铸造中华民族之魂	438

国内外历史比较研究成果介绍

建国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	447
一、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比较方法的发掘与探讨	448
二、对国外比较史学方法的翻译与评介	449
三、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历史比较方法的归纳与研究	451
四、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	452
五、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原则和要求	454
六、历史比较方法的类型与运用程序	455
七、历史比较方法的作用与局限	457
八、关于对历史类比方法的探讨和见解	458
殖民主义奴化教育之比较	463
一、法国殖民者在殖民地西非及印度支那所推行的 奴化教育	463
二、日本殖民者在我国旅大所进行的奴化教育	482
农民家庭与人口状况的关系	496
一、欧洲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	496
二、拉丁美洲农民的生育问题	500
三、阿根廷：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生育	504
四、结论	511
后记	513

经 济 篇

第一章 中西方步入近代前的 经济差异与不同走势

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成为人类历史的先行者。然而,就在历史将要步入近代的时候,由于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中国开始由先退后,急剧衰落,而西方则开始由后至先,迅速崛起。历史的发展出现如此大的变异,其原因和结果何在?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历史进程中的易位及其原因

(一) 历史进程中的易位与经济差异

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在中世纪时,也曾是世界上
最发达的国家。它曾经创造了封建社会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
以致于历史的天平在东西两端长达几千年内不能平衡。但是,到
了16世纪,即古老的中国开始向中世纪冲刺的时候,西方却迎头
赶上。它们不仅同中国的差距日趋缩小,而且在某些方面走到了
中国的前面。中西方此时所形成的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发
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等方
面。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首先,在农业生产中,这时中国的劳
动工具还停留在主要以畜力为动力的阶段,如龙骨车、筒车等。而
西欧国家这时已开始普及两轮铁犁、螺旋运水机、单筒、双筒吸水机
及水磨等;在耕作方式上,虽然堤塘耕作法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
展,水稻种植开始推广,并引进不少农作物新品种,如玉米、花生、

棉花、烟草等。但此时的西欧，三圃制已广泛流行，畜牧业、园艺业和果园业也已发展起来。在有些低地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大牧场。伴随着农牧业的发展，西欧国家人口增长比起同期的中国也要迅速得多。而人口的增加为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使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此外，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这时期的西欧，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生产率都比中国要高。例如，英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耕旱地 120 多亩，通常年收入近 12000 斤粮食。而中国江南地区的一个壮劳力通常耕水田 10 亩左右，年产大米 3000 斤。其次，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以“丝绸之国”闻名于世的中国的纺织生产和技术在世界曾经是独步一时的，其纺织工具种类繁多，类型专业化。而西欧的丝织技术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在 15 世纪前，西方国家纺织工具的改进和发展要比中国慢得多。但在这之后，西方国家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了自动纺车，并开始纺织业中，使用水力机械，如起绒机，漂练机等，由此，其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开始明显提高。此外，在冶铁技术方面，中国先于欧洲 1700 多年冶炼生铁，而西欧 12 世纪才从东方学到炼金术，但到 16 世纪末，英国许多地方已有一周生产 3 至 4 吨的炼铁炉，在德意志、法兰西等地还出现了鼓风炉，从而引起欧洲冶金技术的变革。总之，就这个时期中西方的社会生产力来说，虽然彼此相当，各有千秋，不过，西方国家已显示出后来居上的迹象。

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社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同期的西欧相比，要高得多。但到了后期，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不如西欧，出现了明显减慢的趋势。比如，农业方面，从宋盛世时的 11 世纪到 16 世纪中叶，中国的农产品总量 500 年间增长了 1.5 倍，而西欧国家的农产品总量同期内却增长了 2.7 倍。手工业方面，西欧这个时期也比中国显得要快。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了手摇纺车，到北宋时出现多锭纺车，中间相隔 1300 多年。而从北宋到明代，600 年间纺织工具基本没什么大的进展。而西欧国家 14 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中国晚了近

1600年,但200年后,它们就从手摇纺车发展到多锭纺车,甚至出现自动纱车,其间比中国缩短了1700年。再如冶炼业方面,中国在公元前600年时开始冶炼生铁,而欧洲则晚于中国1700多年。但到16世纪,它们基本达到同一水平。其间,中国经历了2100多年,而西欧则只用了400多年。速度上的优势同样地为西方后来居上奠定了前提。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方面,从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看,中国要稍晚于欧洲。西欧在14、15世纪时,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开始出现手工工场。中国则在明朝中叶(1436—1619年)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工扩大,以交换为目的的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以及国内外贸易的繁荣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市场的骤然扩大,西欧国家出现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它对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在这同时,西欧国家还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即土地占有制的变革。这主要是通过圈地运动来实现的。其中,英国的圈地运动规模最大、时间最久,也最典型。英国经过长达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封建关系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英国在17世纪中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在18世纪60年代,又通过工业革命,最终确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至于别的欧洲国家,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到18世纪末,法国经过大革命,为其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其它的欧洲国家到19世纪中期,经过1848年革命,也不同程度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在中国,虽说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曾到达亚、非的30多个国家,并且无论从船队规模、航程,还是技术装备来说,都比半个世纪后的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遥遥领先,但由于明朝没有也不可能抓住这样的契机,因此,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没有起到作用。相反,由于明朝时期对民间商船、海外贸易实行“海禁”,却